

有原则改正的《兴国县土地法》



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旧址。陈鹏 摄

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旧址——潯江书院,位于兴国县潯江镇文昌路,由南而北建在一条中轴线上,四周均建有围墙,院内建筑面积1689.9平方米,占地面积4903平方米,书院共分为五进,依次为砖木结构,硬山顶、魁星阁为纯木结构,歇山顶,前有如意斗拱和冲天式红石四柱三间牌坊,左右有土木结构房两栋,墙上保存有“二战时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

高潮、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杀工农”等12条苏区标语。

1929年4月,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首次来到兴国,住潯江书院文昌宫。在这里召开了兴国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制订了《兴国县土地法》和《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举办了由陈奇涵、胡灿、肖华等48人参加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毛泽东在训练班上首先报告并详细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和《兴国县土地法》,训练班办了7天。通过办训练班,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为兴国能够成为土地斗争的先进区域和“创造第一等的工作”先进模范县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1年,毛泽东在《兴国土地法》的按语中指出《兴国土地法》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

“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是我党从实际出发探索正确的土地斗争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付诸实施的历史见证。7月在上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随即分配于贫农”“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势,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后来闽西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办法,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由于正确的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了“分田地真忙”的大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中,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60多万人得到土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1930年初,红四军由闽西到赣南。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批判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阻碍土地斗争的错误,决定一要“分”,二要“快”,端正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方向。“二七”会议后,赣西南土地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1957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旧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



寻乌调查专题陈列宝里的“调查现场”。彭亚东 摄

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

有这样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对毛泽东来说太珍贵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寻乌这个县,处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寻乌县的区乡干部,另外还有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这10多天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丰

硕的调研成果,毛泽东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从这个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看,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毛泽东着重调查了以下几个问题:关于寻乌的商业情况、关于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等。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革命本身意味着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地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在土地革命中出现“左”的偏差,往往首先是在阶级成分的划分上,将一些人的成分作了拔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依靠和团结对

象。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献了出来,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人

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

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为了帮助那些不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志学会调查,毛泽东在文章中特地讲到了调查的技术问题。他的经验是: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方法,对于我们当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寻乌调查专题陈列室。彭亚东 摄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的有利时机得到发展壮大,红色政权更加巩固。1930年10月,军阀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合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国民党主力近6个师于1930年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树(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

安、吉水、永丰、宜黄等地进攻。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力由新喻(今新余)、清江(今临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实行战略迟却,依靠根据地优越条件反攻歼敌,粉碎“围剿”。

1930年12月27日,反“围剿”战争开始。红军以1个团钳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钳制西面进攻刘

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000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此诗作于1931年早春,其时正值冬春交替之节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万千林木被霜染红,烂漫盛开之景。虽有寒意但诗人笔下根据地的冬天却生机盎然。



位于瑞金市叶坪谢家祠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杨友明 摄

1927年,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历经了艰苦卓绝的4年地下斗争之后,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与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置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很不安全。同时,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将中央机关秘密迁至江西苏区的瑞金。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陈云于1932年底先后由上海出发,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与在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为博古。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项英、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肖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

横扫七百里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告捷

1931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不甘于第一次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惨败,蒋介石又纠集了20万重兵,以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坐镇南昌,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

敌人吸取了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惨败的教训,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自江西吉安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个800里的弧形包围圈,压向中央苏区,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军队分4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当国民党军推进到吉安的富田、宁都的东韶及广昌一线时,便筑起了坚固的工事,妄图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前去攻坚。

面对敌人的新战术,毛泽东、朱德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

5月中旬,国民党军乖乖听从了毛泽东的“调遣”,从富田出发,分三路向东固前进。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在吉安东固一带打响。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分,从东固附近的黄沙坪村向东出发,在吉安的东南与泰和、兴国交界处的白云山,与国民党军遭遇,红军以小部分兵力与配备了重机枪、迫击炮的数营敌军,激战了半个多小时,打垮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在左右翼红军主力的配合下,干净、彻底地围歼了国民党军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取得反第二次大“围剿”首战告捷。

随后,红军立即转入进攻阶段,从吉安附近的富田向东横扫,直打到闽赣交界的建宁等地。“十五天中(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战后,毛泽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挥毫填写《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一首: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这位“泣”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在当地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的黎川、南丰、闽西的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